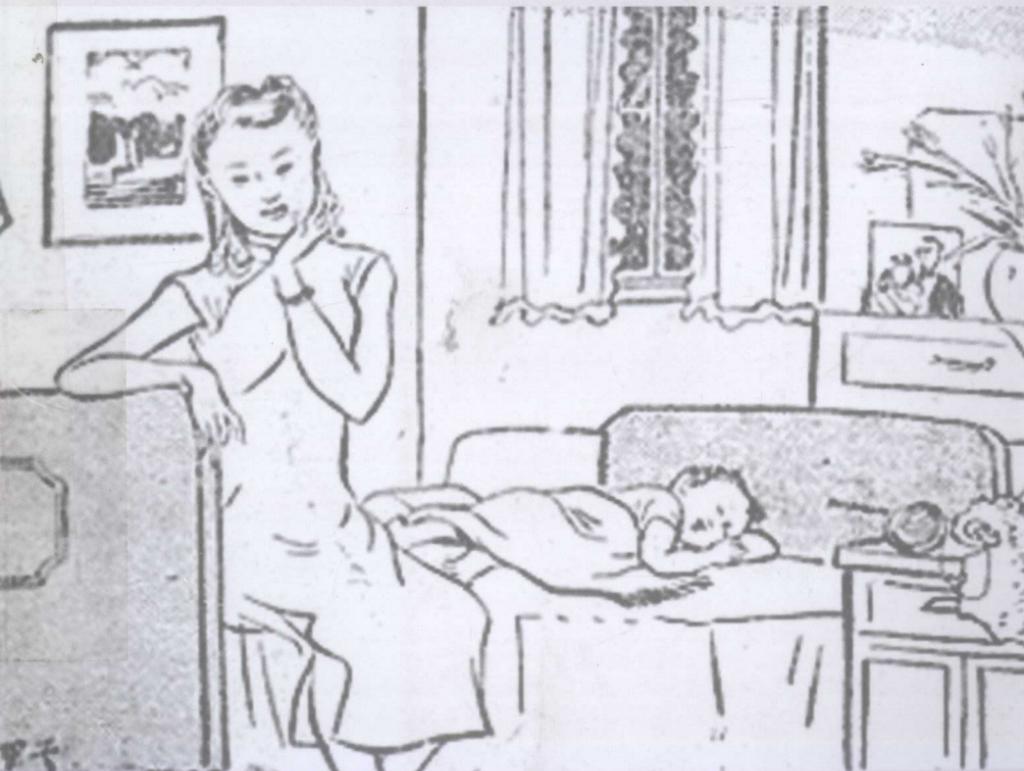


现代都市与日常生活的再发现

— 1942年～1945年上海新市民小说研究

刘轶著



现代都市与日常生活的再发现

—— 1942年～1945年上海新市民小说研究

刘 轶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都市与日常生活的再发现：1942 年～1945 年上海新市民小说研究 / 刘轶著 . —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 - 7 - 5482 - 0440 - 4

I. ①现… II. ①刘… III. ①小说—研究—上海市—1942 ~ 1945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6586 号

现代都市与日常生活的再发现

——1942 年～1945 年上海新市民小说研究

刘 轶 著

策划编辑：张丽华

责任编辑：张丽华 谢 程

责任校对：段建堂

封面设计：张 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佳迪兴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9

字 数：232 千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2 - 0440 - 4

定 价：25.00 元

社 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邮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 - 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 - mail：market@ynup.com

目 录

引 言 (1)

上篇 新市民小说总论：历史渊源、 艺术旨趣与内在思想

第一章 现代大都会与市民群体的勃兴

——新市民小说诞生的现实根基 (25) 1

第一节 上海：大都会的诞生 (25)

一、“城”与“市”的冲突和融合 (27)

二、现代上海：崭新的城市进程 (32)

第二节 上海现代市民群体的兴起 (46)

一、“中/西”市民概念的差异 (47)

二、中国市民群体的自我发展道路 (49)

三、对“小市民”的一点思考 (57)

四、现代上海市民群体的性格特征 (58)

第二章 现代市民文化的崛起与都市精神的新建构

——对新市民小说文化背景的分析 (64)

第一节 近现代以来市民文化的转变：实利、民主

与科学 (64)

一、西方民主思潮的冲击 (66)



二、科学理性的逐步导入	(69)
三、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和建立	(70)
第二节 上海现代市民文化的重要特征	(72)
一、浓郁的商业气质	(74)
二、褒贬不一的求新精神	(77)
三、表现自身日常生活和审美趣味的世俗心态	(80)
四、两难境地中的中西交融	(82)

第三章 从“宋话本”到“白话青楼小说”

——对新市民小说历史渊源的追问	(85)
第一节 对“市民小说”的一种溯源	(85)
一、市民小说的开端	(86)
二、古代市民小说的繁荣	(89)
第二节 时代交叉口的变革：晚清白话青楼小说	(92)

2

第四章 新旧融合与跨越雅俗

——新市民小说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趣	(99)
第一节 新市民小说艺术风格的发展轨迹和最终	奠基
奠基	(100)
一、“旧文艺”朝“新文学”的靠拢	(106)
二、“新文学”对“旧文艺”的借鉴	(117)
第二节 “雅/俗”、“新/旧”意趣的出色交融	(123)
一、张爱玲的“雅/俗”融通与“新/旧”结合：	
新市民小说的艺术典范	(123)
二、新市民小说代表作家的创作成就和理论	
建设	(129)

第五章 日常生活与生命意义的再认识	
——新市民小说创作的内在思想与生命	
体验	(137)
第一节 新市民小说创作生命体验形成的具体机缘	
机缘	(138)
一、沦陷：上海作家的流失和写作领域的空出	(138)
二、生存：写作的现实顾忌与市场诱因	(142)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首肯和张扬	(146)
一、“旨在自我维护的活动”的日常生活及其审美方式	(146)
二、以日常生活逻辑消解宏大叙事	(151)
第三节 新市民小说家对世俗人生的再认识	(157)
一、乱世中“人”的生存体验	(159)
二、低调的写作姿态和世俗化的题材领域	(160)

下篇 新市民小说代表作家论

第六章 都市女性的快意言说：苏青与潘柳黛	(166)
第一节 乱世中的平凡女性——苏青	(167)
一、市民本位主义·《天地》杂志·人生悲剧	(168)
二、率真的言说方式	(179)
第二节 女性隐秘世界的大胆揭示——潘柳黛	(186)
第七章 日常生活意识的现实认同：予且、周天籁	(196)
第一节 市民生活的拥戴者——予且	(197)
一、热烈的市民情趣	(198)
二、亦新亦旧的小说	(204)
第二节 欲望都市中的一抹同情——周天籁	(212)



一、欲望下的日常人生	(214)
二、沪语写作的灿烂余晖	(219)

第八章 现代商业社会认知的二重性：丁谛、

周楞伽	(223)
-----------	-------

第一节 商业社会的认同与批判——丁谛	(224)
--------------------------	-------

第二节 市民的激愤和豪迈——周楞伽	(236)
-------------------------	-------

第九章 爱与青春年少的世界：谭惟翰及“东吴系”

女作家	(244)
-----------	-------

第一节 “爱”的情怀——谭惟翰	(246)
-----------------------	-------

第二节 如花绽放的青春——“东吴系”女作家	(256)
-----------------------------	-------

4 主要参考文献	(272)
----------------	-------

后记	(279)
----------	-------

引　　言

对 1942 年至 1945 年上海新市民小说的研究，已有很多前行者在这一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后人面前竖立起了一座座丰碑，这些成就让人对他们充满敬仰之情，如严家炎、陈伯海、魏绍昌、范伯群、钱理群、范智红、吴福辉、杨义、陈思和、袁进、王文英、朱文华、陈子善、杨剑龙、许道明、陈青生等先生，以及稍后一些的年轻学者如孔庆东、李今、姚玳玫、李楠等人。他们的累累硕果让后来者绕不开，也躲避不了，客观上成为后来者的压力所在。然而，这压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是后来者前进的阶梯：或许正是这些研究，让我们有可能站立于其上，仰视更高的星空、更遥远的地方，发现与前人不同的景色。也正是这种念头，能让后来者寻求不同，从而找到自己研究的坐标。

纵观以往在该领域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两种模式之上：或是将这一时期的新市民小说归属在“海派文学”中来论述，或是将它置于“沦陷区文学”来考察。这两种方式自然各有千秋。在第一种方式中，大多数的研究者关注于它与海派文学之间的渊源、特性。如吴福辉先生就将这些作家的作品称之为“新市民体”的小说，认为它们“已经达到与现代主义相对接的程度”；^① 许道明先生则将这些小说归属于海派文学“成熟期”的

^①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 91 页。



代表作，认为这些作家（张爱玲除外）的作品是“浮动在市民生活的表层为市民的悲欢写真”，称之为“新市民派”；^① 姚玳枚将其称之为“平民叙事”；^② 李楠则细致地将“通俗海派”与“鸳鸯蝴蝶派”区别开来，认为这些小说具有“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和“迎合读书市场”两种特性，是丧失了“‘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的海派”，“应当是海派中的通俗文学”，^③ 等等。在第二种方式中，大多数的研究者关注于它在沦陷区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所提供的新的文学经验。如孔庆东就将其放在沦陷区文学中“雅俗文学的互动”来谈论，并置于考察对象中的第十二类“雅俗之间的小说”来具体分析，认为它们是“通俗文学的雅化”，是介于“雅俗之间”的代表。^④ 陈青生在研究“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时，则将这一群作家分别归属在不同的类别中进行考察，如将谭维翰、周楞伽等人划分到“《杂志》作家群”来考察，将张爱玲、程育真、施济美等人划分到“小说新秀”中来考察。^⑤

2

不过，对于这一时期的新市民小说，尽管以往的研究有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还是留下了不少可值得继续探索的领域，诸如：新市民小说与现代中国都市的进程究竟有着何种密切的关联？何以在同时代的中国，只在上海这一片土地上才能出现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上海这一现代化的都市、市民群体、市民文化究竟又在

① 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316页。

② 姚玳枚：《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226页。

③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绪论，第6页。

④ 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五章，“雅俗文学的互动”。

⑤ 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228页。

其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与宋代以来的古代市民小说又有何继承与区别？它的内在思想和美学旨趣究竟是什么？它们这些特性又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文本体现出来的？等等。或者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述，则是：“新市民小说”究竟“新”在何处？是“新”在“新的市民”，还是“新”在“新的小说”？抑或是两者皆有之？如果是“新的市民”，又“新”在何处？如果是“新的小说”，又“新”在何处？如果两者兼而有之，那么就更应该谈清楚，“新”在何处？

基于以上的思索，本书力图将这一领域的小说从以往固有的研究模式中分离出来，避免带有先入为主的思路，从而又简单地把它归属到某一概念之下；在考察过程中，也尽量从每一个具体的作家和作品出发，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同时，这样做的原因，也是不想自己的研究被许多空泛而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概念所淹没。

在笔者看来，新市民小说之所以“新”，不但“新”在“新的市民小说”上，同时也“新”在“新市民的小说”上。如果说前者更强调于它“新”在小说技巧、美学趣味上，那么后者则指涉于新的思想和新的意识形态上：前者的“新”，显示出了新市民小说在艺术特征上，跨越了雅俗，融通了新旧，获得了审美意义上的新异之处；后者的“新”，显示了新市民小说在内在思想上，已经与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都会文化精神和建立在西方契约观念之上的市民日常生活意识有了直接的关联，即它不但以现代市民哲学取代了古代封建市井意识，同时也以世俗化的日常生活意识取代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人道”等精神诉求。正因为以上的“新异”之处，使得它不但与古代市民小说有了不同，同时也与“五四”以来的正统新文艺有了不少的区别。

在具体写作中，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总论”，主要从总



体上来论述新市民小说产生的现实基础、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它的内在思想和美学旨趣，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全面梳理的工作。下篇为“作家作品论”，主要从具体的作家作品（亦即从具体的文本）来考察新市民小说的种种特性，这一部分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读工作。这种考察方式尽管不是百分之百的能够避免研究陷于空泛，却大致能让研究落实到细节之上。而其中内在的一个逻辑关系则是：首先，对新市民小说的现实基础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厘清新市民小说的产生与上海都市化进程的内在关联；其次，分析上海独有的市民群体和市民文化，从而将支撑新市民小说发展的内在文化精神凸现出来；第三，对新市民小说的历史进行深入的追寻，不但看到它与“鸳鸯蝴蝶—礼拜六”、晚清白话小说之间的承接，更需要看到它与中国宋代以来市民小说割舍不断的渊源；第四，从新市民小说的内部来考察，分析它的艺术特征和美学思想，将它的“新异”之处追寻出来，这是本书的重点所在；最后，从具体的文本来进行考量，比较详细地分析该领域的代表作家和作品。这种写作的逻辑关系还便于从纵横两个层面来分析新市民小说的种种“新异”之处：从纵向来讲，与宋代以来的古代市民小说相比，新市民小说的思想根源和艺术特征有何异同；从横向来讲，与同时代的新文艺小说、通俗小说相比，又有什么异同。通过纵横两个层面的对比，才能够比较全面地将新市民小说的种种特征（无论是内在思想上的还是艺术上的）梳理出来。

在本书看来，新市民小说是市民文化重要的艺术体现形式之一；就中国的市民文化而言，世俗化思想和日常生活意识是它的内核，市场化是它的强大动力，通俗易懂是它的重要特征；市民文化尽管一直受到“正统”文化的排斥和挤压，尽管常常被边缘化，然而它却顽强地、不停地自我生长和发展，正如同一条蜿蜒流淌的暗流，当外部压力增大的时候，它便潜下去独自流动，

当外部压力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它便浮现出来，以各种样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它常常从各种“正统”的文化形态之外建立起自己的价值系统和艺术风格，乃至“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品格”，^① 从不经意的“角落”中为我们提供文化艺术上的惊奇，尽管有时它的表现方式粗鄙直率（如明清时际的艳情小说），然而它所蕴涵的“有生命活力的新生意识”、^② 个体意识和体现出来的社会意义，都不能忽视（又正如葛兆光先生曾提醒研究者的那样，对于那些被已经认为是“正统”文献的习惯性使用，并不一定能还原出对历史的真实面貌。在进入我们的叙述之前，这些文献已经经过了重重的选择、编辑、写作和评述，经过了“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原则和历史学叙述的过滤，已经未必那么可靠了。而流行于民间大量的有名或无名的日记、碑刻以及通俗性读物，“反而并没有经过这种有意识的‘筛子’，倒有可能有利于重建或呈现思想的真实历史语境”。^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市民文化正是能较为可靠地还原真实历史语境的重要文本）；它常常透过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发现最为永恒的生命基础和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所流失的最为稳定和持久、最为实在的一面，从而也才得以更加贴近历史文化中人作为主体意识及其内心精神世界真实一面——它所认为的人生意义，不在于它处，不在于此世界之外的任何一个世界，就在于普普通通的琐碎日子中。此种思想乃是建立在世俗化之上的个人主义的普遍的人生观。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这种思想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新市民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此一时期的新市民小说，相对于 20

① 宋子俊：《市民·市民文化·市民文学——略论市民在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作用》，《甘肃社会科学》，2001 年第 6 期。

②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89 页。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05 页。



世纪 20 和 30 年代略带夸饰的都市小说（诸如穆时英、刘呐鸥等人作品），更加重视于表现都市生活本身的实在意义和琐碎日子中体现出来的审美趣味，显示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内容和内心世界，因而才具有相对于以往市民文学中表现都市生活和日常生活意识的不同意趣，也具有“再发现”意义。

同时，中国的市民文化是建立在中国特有的市民和市民群体之上的。中国现实意义上的市民和市民群体，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尽管没有作为独立的阶层活跃于国家政治生活中，但它们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活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日常生活之中，并由此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中国整个的历史社会面貌，促进着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亦即是说，中国的市民和市民群体，虽然缺乏如同西方市民阶层一样的国家政治权力意识和参政力量，但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文化变革、社会生活等方面，依旧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由此而致使中国的市民文化也是在这样一种潜移默化的状态下发展、变革并影响着中国的思想文化，但不管如何发展，也终究没有能成为占据中国社会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化。当然，市民文化也有着它的重大弊端，市民文化常常仅止于现实问题和实际利益的品味，妨碍了它获取更为广阔和深厚的人生思考和生活体验，这是它无法克服的缺点。

本书对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新市民小说研究，总体上是置于这样一种大背景和思路中来进行，并重点考察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市民小说诞生的现实根基

在这一部分中，将考量新市民小说在上海出现，除了沦陷时期上海作家的流失和写作领域的空出这一直接原因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里面？可以发现，新市民小说之所以诞生在上海，是与它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背景密不可分的。简单来讲，上

海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但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形态，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群体，更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市民文化。正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市民群体和市民文化，从最为基本的物质形态、市场需求、文化精神等方面为新市民小说的诞生做出了充分的准备。一旦假以时机，新市民小说便跳跃入世，成为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倘若没有上海这座城市，没有依附于这座城市中的市民和市民文化，新市民小说也就不可能出现——考察新市民小说而不考察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会上海和具有诸多特性的上海市民、充满矛盾而又丰富异彩的上海市民文化，将无法从根本上厘清新市民小说种种的内在特性和思想。一般来说，对于这一时期新市民小说的崛起，大多将之归于“沦陷”影响，认为战争的爆发及其随后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是上海新市民小说成熟与勃兴的主要外部诱因。这种看法当然是正确的。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深刻影响了上海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大量的上海作家纷纷流亡，新文学阵营的明显萎缩、新文学作家群体的集体流失，为新的作家群体在沦陷区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不过，这种直接的诱因和特殊的机缘背后，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根基，那就是上海这座现代大都会给予了新市民小说诞生所必需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而这种环境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历经长期而复杂的演变。从上海的发展可以看出，它经历了从中国传统的“城市”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都会”的过程。这种新型的现代大都市是如此的多姿多彩、含义丰富，因而具有如此众多言说的可能性。依照林佩瑞（Perry Link）所言，它是一个让大众对它充满了“焦躁的既爱又恨的矛盾情绪”的



城市，^①有人干脆将它认定是一个“日常生活漫布着矛盾的情绪”的城市。^②然而，不管人们对它的看法如何，在短短的时间内，一座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都市出现了。它似乎藐视着一切既有的传统、一切意图牵制它的力量，用一种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速度和方式前进着，将自己展现在中国这一个古老的地球上，展现在所有人眼前。无论是经济模式、人口数量和结构，还是城市面貌、文化消费方式，都让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一座真正的大都会——“上海在1842年开埠后，迅速从一个传统市镇变成一个洲际大都，是当时中国唯一具有现代的城市化意义的城市”，^③——而它的出现，为新市民小说产生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空间基础。

8

与此同时，生活于其间的“市民”，则为上海新市民小说提供了无穷的发展动力。一般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市民群体是在民族危机和半封建半殖民的条件下产生的，是借由西方民主思潮的冲击、科学理性的逐步导入、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和建立等方面条件下产生的，并非是从中世纪社会结构中发展而来，因此与欧洲的市民等级相比较，具有很多自己独有的性格特征。按照陶鹤山先生的分析，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市民群体身上，已经体现出了中国自身的现代性，“这些大量的现代性成分和因素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④而对于上海市民的性格特征，白吉尔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角度来看，认

^① 转引自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② 转引自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③ 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

^④ 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为：“为了生存和发展，上海人富有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正是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接受西方人带来的思维和形式，把它们吸收消化，并转化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她向全中国做出示范：何为洋为中用。在这里，古老的中华文明和西方的现代文化的相撞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达到平衡的。”^① 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其实也可以说，中国“市民群体”的“实用主义的方式”，并非仅源自近代以后中/西方文化和农耕/商业文明的冲突，而更源自于对世俗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现实经验之中。正如赵园先生所言：“市民与农民，都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自然是在这个概念含义的较低层次上。他们生活的世俗、物质性质，他们面对的生存问题的具体琐细，他们所处社会经久而厚积着的经验、常识，以及教养、知识水平的限制，都有助于造成关心基本生存注重实际的‘现实主义’。……小民的人生叫他们感受到生命的朴素与坚实。”^②

可以认为，新市民小说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上海近现代以来市民群体与市民文化的发生与行进。正因为上海近现代市民文化中的种种特质，才使得新市民小说中的种种特色得以凸现。假如没有这一层的关联，新市民小说之所以成为“新市民小说”中重要的几个因素：新型的市民意识、新型的文化消费市场、新型的文化运作方式等，就无法在新市民小说中得以体现。而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往往决定着当时整体性的艺术精神气质，假如没有这样的市民文化，新市民小说也就无法与别的市民小说区别开来，换言之，“新市民小说”也就无法从精神气质上形成它的“新异”之处。这种精神气质，唯有在合适它的土壤中，才能得

① [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3页。

②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10

以生根、发芽、成长。这种土壤具体到这里，就是上海特有的市民文化氛围。可以说，随着上海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现代都市经济模式的建立和居民人口结构的变化，上海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群体；与传统的市民群体不同，他们接受了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观念，以及在此观念下衍生出的平等观念、契约观念、竞争观念、自由观念和个人主义、科学理性主义等等思想，使得上海产生了新型的市民文化。在这种市民文化大环境中产生的新市民小说，一方面，由于文脉传承的生生不息，它有着以往市民小说的某些特征，但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它呈现出了与古代市民小说不一样的内涵，从最外在的语言表述到最内在的思想观念，都具有新的模式和意义。从它的艺术特征、美学趣味，到它表达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已与以往的市民小说迥然相异；到了20世纪40年代，当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之后，以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人的陡然崛起，标志了新市民小说时代的来临。

二、新市民小说的历史渊源

在分析清楚新市民小说诞生的现实根基之后，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新市民小说究竟是横空出世的无本之木，还是有着其艺术上的深层根源？吴福辉等先生将新市民小说的历史渊源追溯到海派文学的脉络之上，一直追溯到晚清。无论是张爱玲、予且、丁谛，还是苏青、潘柳黛、周楞伽，他们从古典文本中吸取的养分只怕远远要超出我们的想象。因此，将新市民小说的文脉追溯到明清、甚至追溯于宋，发现它与古代市井小说中或多或少的承接关系，发现它们之间的藕断丝连，看到它对于古代市井小说的融合、吸纳与变化，方才能真正理解新市民小说真正作为“新”的本质所在。新市民小说尽管是现代的产物，然而它必然有着历史的因缘。谈论“新市民小说”时，所隐含的一个含义